

62742/2/2/2

0144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论我党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

常好礼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1991年7月

论我党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

内 容 提 要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时起就确立以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历史。

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要结合得好是不容易的。七十年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曾经有过三次大的成功和三次大的失败。三次成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推进四化建设。三次失败是:陈独秀所犯右倾错误;王明所犯“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所犯“左”倾错误。

在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我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文意在总结这些经验,以提高贯彻党的这一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自觉性。文章认为这方面的经验主要有四条:第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首要的是正确认识国情;第二,要结合,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第三,要结合必须正确开展反倾向斗争;第四,要结合,还必须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结合的自觉性。文章以史实为依据,对这些经验作了较详细的论述。

论我党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时起,就确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怎样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不是一下子就解决了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坚持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并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历史。

在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党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大体说来,70年中,我们有过三次大的失败和三次大的成功。三次大的失败是:民主革命时期陈独秀所犯右倾错误、王明所犯“左”倾错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左”倾错误。三次大的成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又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而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阶段。

70年来,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致力于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并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科学地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坚持和不断丰富、发展马列主义,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以至于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党史界同行。

(一)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首要的是正确认识国情。

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①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指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途径:以阶级斗争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马列主义没有、也不可能给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规定实现这一总目标的具体道路。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过程中,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国情、本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揭示本国革命的特殊规律,也就是抓住本国革命这一事物的根本,从而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才能动员和鼓舞人民群众,完成各自的革命任务。否则,如果只是把马列主义的现成条条拿来机械地

套用,那就绝不可能“抓住事物的根本”。其结果,只能使理论脱离群众,失去群众对理论的信念,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损失。

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把马列主义学说当作救国救民的真理来学习和掌握,因而首先注意并较好地抓住了马列主义学说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内容,即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迅速地将理论付诸行动。他们很少对马列主义作学院式研究和学习的习气,而是边干边学,在实践中逐步掌握它的理论体系,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党的历史表明,要结合得好,首要的就是要把马列主义运用于国情的研究,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国情。只有这样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党历史上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此紧密相关。

认识和把握国情,就是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各阶级的状况,把握社会的性质,抓住主要矛盾,确定特定阶段的革命任务。这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陈独秀和王明的错误,一个表现为右,一个表现为“左”。然而究其错误的思想理论根源,都是在国情的分析和把握上犯了错误。他们都未能深刻认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特殊状况。前者夸大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轻视农民,害怕农民,认为中国现时的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就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后者则是机械地套用共产国际“三个时期”的理论和关于资产阶级的分析,把中国的“中间力量”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同样忽视了农民阶级,而由无产阶级单枪匹马去冒险攻坚。

在我们党内,毛泽东在他的革命实践中较早地认识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认识到这种结合首要地是研究和把握中国的国情。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不朽的著作。这些著作,无不闪耀着对中国国情精辟分析的光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正确地分析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指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逐步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及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经过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建国以后,我党对国情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及实践时期;党的“八大”至“文革”前时期;“文革”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之后,如何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并使社会生产力获得高速度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更加艰难的任务。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曾经设想过这种转变的一般原则。但是他们的设想,是以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的。苏联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但情况与我们有很大的区别。我们是想要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照搬书本不行,照搬苏联的经验也不行。在这一社会发展大转折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又一次成功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正确地分析了国情,借鉴苏联的经验,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党中央和毛泽东当时对国情的分析是：新中国建立，推翻了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没收了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建立了国营经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成为个体劳动者，农民存在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中间阶级。因此，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根据这一分析，党中央在1952年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一系列实现这一总路线的方针和政策。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成功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根据中国国情的实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条道路不同于马、恩的设想，也不同于苏联的做法。它是中国式的。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之后，我国的历史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和平建设的阶段。党需要根据国情的新变化作出新的决策，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完成了这一任务。“八大”对国情的分析是：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因此，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②“八大”由此认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③由于“八大”的正确决策，自1956年以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是，在“八大”以后不久，党对国情认识上却产生了剧烈摇摆：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接受了修改“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的意见，标志着党对国情认识上“左”倾的开始。1958年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作出了改变“八大”决议的结论。党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认识上的回转，在实践中酿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在这一时期中，受关于国内主要矛盾认识上变化的影响，加之对当时国民经济相对的迅速发展盲目乐观，致使党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也出现了混乱，发展到藐视经济规律，搞“大跃进”，搞“穷过渡”，号召并开始迈出了在农民富裕起来以前就利用行政手段过早地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步伐。其间虽有小的调整，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到了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导致“文革”十年动乱。“文革”时期毛泽东代表党提出的对我国国情的认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在这种对国情错误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错误认识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上述关于国情的认识及在这一错误认识之上的错误理论造成了十年动乱的严重灾难。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纠正了上述错误，重新正确认识国情，确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和四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党的历史证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首要的就是

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正确认识和把握国情。结合得成功与否,关键就在于此。过去在一个时期中,特别是在“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把我党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加以歪曲,引向邪路。他们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把这一原则简单化、庸俗化,认为用“语录”对照,搞“立竿见影”就是结合,造成了恶劣影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绝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工作方法问题。更重要,或者说更根本的,它是一个世界观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④

(二)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二者结合很不容易。”^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也说:“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一件具有根本意义又很不容易的事情。”他们都指明了这种结合的不容易,这是从我党几十年经验中得出的结论。这种结合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客观实际是复杂的,变化的,对实际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有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因此,错误是很难避免的。结合得好不好,对国情、对实际的认识正确不正确,用什么标准来检验?用实践标准。“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认识、理论、方针、政策,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实践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必须坚持实践标准。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都是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我们党建立之后,一开始也是走的这条路,在城市发展组织,从事工人运动,积蓄力量,准备暴动。那时党的领导人坚持“城市中心论”,在大革命失败后仍然继续主张夺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他们认为这是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然而毛泽东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在中国封建军阀控制大城市的条件下,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因此,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率领工农武装退出城市,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农村根据地,并由此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农村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毛泽东提出的这条道路,在马列主义的书本中是找不到的。因此,当时党内许多人不相信这条道路是正确的,有的甚至指责毛泽东到农村去是“农民意识”、“保守主义”。

究竟哪一条道路正确的问题,不是空谈理论所能解决的。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的实践作出了结论,证明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及由此而来的战略战术是正确的。因此,党中央才有可能在遵义会议上首先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遵义会议的胜利,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则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时期,如何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难度更大。这不仅因为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可借鉴的经验越来越少,也因为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留下的系统论述也不多。加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千变万化,想按照书本或别国

的经验去办事是根本行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依靠我们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自己的实际去探索、去创造。这就更显示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的极端重要性。

如前所述，自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对国情的认识逐渐脱离了实际，其指导思想逐步“左”倾，最后演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十年动乱”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晚年犯了“左”倾错误。十年动乱结束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在理论上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把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转到了正确的轨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则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与遵义会议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曾经进行过反复论述，为什么我们党历史上一些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却一再背离这一观点而许多人却不敢反对呢？为了批判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写了《实践论》等一系列著作，更加明确、清晰地阐述、发挥了这一观点；《实践论》问世以来，这一观点更是为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干部所熟知，那又为什么会出现“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和“文革”之后一个短时期的“两个凡是”的错误，党不得不在1978年就真理标准这一本来十分清楚的问题进行一场大讨论呢？这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有两点是重要的。

一是认识上的原因。前面已经指出，我们党在接受马列主义之后，就迅速投入了革命的实践。处在幼年时期的党缺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经验，对实践标准认识不深，因而在一个长时期内产生了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教条化的倾向，以为苏联革命胜利了，我们只要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照搬苏联的经验也就可以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再就社会主义来说，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但更多的还有待于在实践中探索。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观察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時候，自觉不自觉地吧民主革命时期从事阶级斗争的经验搬了过来，以为那时成功的经验今天同样适用。况且这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思想和做法，往往加上被误解或教条化了的马、恩、列、斯的某些设想和个别论点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使人难以或不敢提出疑义，即使在实践中失败了，也往往从别的方面去找原因，而不去考虑根本指导思想上的问题。

二是组织上的。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全、不正常，也是造成坚持实践标准这一原则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坚持实践标准，要求实践证明是错了的，就应及时纠正。但是党内如果没有健全的、正常的政治生活，要做到这一点就比较困难。王明在党内搞“一言堂”，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人们所熟知的。遗憾的是，在毛泽东晚年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在党面临工作重心转移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了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①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正确的意见有时被束之高阁，有时甚至受到严厉地批评或

批判,从而妨碍了对出现的错误的及时和正常的纠正。这是值得永远记取的教训。

(三)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必须正确开展反倾向斗争。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等违背马列主义的错误思想。我们党正是在同各种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的。党的历史证明,影响我们党把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要思想障碍是教条主义。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⑧延安整风从政治上、思想上清算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此后,以王明为代表的这种教条主义就不复存在了。

在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党内又出现了把毛泽东的言论、著作神圣化、教条化的新形势下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的特点是,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招牌,割裂、肢解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粉碎“四人帮”以后所出现的“两个凡是”的论点,虽然在政治上不同于“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搞的教条主义,但其思想实质仍然是坚持把毛泽东的所有言论神圣化、教条化。为了扫除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邓小平同志以极大的理论勇气率先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鲜明地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指出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完整的理论体系才是真正的高举旗帜。^⑨以这一批评为先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扫清了新的教条主义,再次解放了全党的思想。

经过延安整风和批判“两个凡是”这两次对教条主义的清算,我们党内对于教条主义危害性的认识大大提高了,增强了抵制教条主义的自觉性。但是教条主义并未绝迹,这就是以固守条条框框、随风倒、照抄照转上级指示的本本主义为表现形式的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⑩

我们说,教条主义是影响我们党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主要思想障碍,必须坚持不懈地与教条主义作斗争。但党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如果忘记同可能出现的来自右的方面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斗争,也是危险的。“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⑪在我们党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邓小平同志一方面提醒全党要继续解放思想,反对僵化;另一方面也及时地提醒全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作斗争。这是我们沿着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前进的重要保证。事实告诉我们,在当前国际风云变幻,帝国主义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形势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的主要危险。由于一个时期中党的主要领导人放松了警惕,酿成了1989年的一场大的政治风波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党反倾向斗争的历史说明,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必须注意防止另一种倾向,否则会犯新的错误,已如前述。另一方面,为了正确进行反倾向斗争,一是要正确把握错误的

性质,二是要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只有正确把握错误的性质,才能达到总结经验防止重犯的目的。我党历史上,王明曾把李立三的“左”倾当成“调和”、“右倾”来批,结果造成比李立三更“左”的“左”倾错误;“四人帮”把林彪的“左”倾当极右来批,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极“左”。这些都是应当记取的教训。只有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才能达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延安整风时期,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采取的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严格区别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错误和“四人帮”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所犯的罪行,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在理论上拨乱反正,从而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团结。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与反对教条主义斗争有原则的区别。因为教条主义一般表为党内思想斗争,而资产阶级自由化则具有敌我性质。但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必须掌握正确的政策、方针和方法。这就是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是顽固坚持自由化立场还是受自由化思潮影响而产生错误的观点。我们党在对1989年政治风波的处理上吸取了历史上反倾向斗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团结和教育了大多数。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反倾向斗争。

总之,反倾向斗争的目的是为了纠正错误,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以推进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离开这一目的的方针、政策和方法都是不对的。

(四)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必须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这种结合的自觉性。

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目的,是为了正确认识国情,制订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取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如果有了正确的路线,却得不到正确的贯彻执行,这一目的就不能达到。要使正确的路线得以贯彻,就需要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提高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自觉性。对此,邓小平同志有过精辟的论述:“……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党的代表大会来讨论决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委员会讨论决定。问题决定好了,还需要党员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去解决。首先要几万、几十万骨干懂得这条原则(指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引者),这条原则才会得到实行。”^④这就是说,只有当党的大批骨干善于把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根据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解决实际问题的時候,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胜利。因此,提高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自觉性,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经验。

在我们党的幼年时期,毛泽东虽然较早地认识到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并致力于这种结合,但由于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集体缺乏这种结合的自觉性,因而毛泽东的创造不被他们所认识和接受,甚至将毛泽东排除在领导层之外。直到遵义会议,党内少数高级领导人才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认识到这种结合的重要,加上毛泽

东本人耐心地说服解释,才有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到了延安整风,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理论 and 实践才被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所理解和接受,这才有了七大的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团结。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对这个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他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⑨

为了提高干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自觉性,毛泽东写了大量著作,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阐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更是结合批判教条主义教育全党,把这种结合提高到世界观和党性的高度,把它作为党的三大作风向全党提出。毛泽东的教诲以及他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实践,教育了整整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他们成为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并由他们把这一宝贵传统保存和发扬光大。

今天,我们党已经是一个拥有4千余万党员的大党,并正在领导一个十一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需要一大批致力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优秀干部。他们应当善于从实际出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保证我们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为了提高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自觉性,全党必须认真学习党的历史,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充分认识这个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如果不去结合,或结合得不好,就会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遭受损失,甚至会葬送这一千百万人的鲜血换来的事业。

为了搞好结合,必须在三个方面下功夫。第一,要坚持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要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首先要坚决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其次要坚决反对否定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反对他们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粉碎了‘四人帮’,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了它的科学面目,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但是有极少数人不这样想。他们或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⑩同时他又指出:“我们所要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⑪这些精辟的论述,为我们确立了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也是我们应当坚持的一条政治原则。这些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只有科学地坚持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才能真正搞好结合。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马列主义。那次学习保证了我们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当我们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又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际结合起来,“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中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要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

设。”^⑩如果我们按照这一要求去做，就一定会取得学习的巨大进步。第二，要深入实际。只有理论还不能实现结合，还要有实际。毛泽东历来强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辛辣地讽刺了那种夸夸其谈的空头理论家，称他们为“钦差大臣满天飞”。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表领导集体，发扬党的光荣传统，身体力行，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号召党员和党的干部不要脱离实际，要倾听群众的呼声，掌握群众的脉搏，为全党做出了榜样。第三，要善于结合。掌握理论，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如果不去结合，那就会犯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错误。要结合，必须下苦功夫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下苦功夫深入实际，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勤于思考，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照抄照转；要反复学习，反复实践、在实践中增长才干。

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同志开创、全党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我们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决定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正确的思想路线不仅是党制订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前提，也是正确的政治路线得以贯彻的保证。实践已经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依靠这条路线，我们已经实现了四化建设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可以肯定，只要我们继续贯彻执行这条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够完成第二步，以至于第三步、第四步战略目标，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注：①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

②③《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

④《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09页。

⑤《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第344页。

⑥《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第623页。

⑦《三中全会以来》（下），第766页。

⑧《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第777页。

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5、39页。

⑩同上，第133页。

⑪同上，第243页。

⑫《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第342—343页。

⑬《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第499页。

⑭《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7页。

⑮同上，第157页到158页。

⑯同上，第143页。